

# 蒙藏文化关系研究

◆ 乌力吉巴雅尔 著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中国藏学出版社

本成果系中央民族大学  
“十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马丽华

# 蒙藏文化关系研究

---

乌力吉巴雅尔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烨 封面设计：李建雄 版式设计：天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藏文化关系研究/乌力吉巴雅尔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拉巴平措主编)

ISBN 7-80057-649-3

I . 蒙… II . 乌… III . 文化交流 - 研究 - 蒙古族、

藏族 IV .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5396 号

---

## 蒙藏文化关系研究

乌力吉巴雅尔 著

---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字数：300 千

200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 册

ISBN 7-80057-649-3/Z·323

---

定价：28.00 元

##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总叙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惟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

# 目 录

引言 .....	1
蒙藏文化关系鸟瞰 .....	2
文字篇 人名－书名－物名 .....	43
蒙古人名与藏文化 .....	44
蒙古书名与藏文化 .....	54
关于“锡莱高勒”的探索 .....	63
蒙古人借用藏文名词术语的手法 .....	75
佛教文化对阿尔泰语系某些民族语言的影响 .....	86
文学篇 诗歌－神话－史诗 .....	94
蒙古文献中的一首藏文箴言诗 .....	95
莫日跟格根及其《萨迦格言》的翻译 .....	106
《慧图莫日跟特么呢的神话》初探 .....	129
关于《喜地呼尔》与《尸语故事》 .....	142
蒙藏《格萨(斯)尔》的比较 .....	175
蒙藏《格萨(斯)尔》的关系 .....	205
格斯尔汗原型试探 .....	237

---

<b>文献篇 记述－写作－翻译</b>	244
藏族历史年鉴中有关蒙古的记载	245
罗桑泽培及其藏文故事集	254
回眸蒙古族的藏文文献	266
拥有藏文文集的蒙古族著名学者	282
关于阿拉坦汗法典	298
近年发现的《布顿佛教史》蒙古文译本	311
<b>文化篇 科技－人文－历史</b>	323
关于“腾格里”的探索	324
蒙古人的纪年法	340
关于锡热图固实却济的新论	353
论《乃济托因传》	370
关于《彰所知论》及其他	392
《蒙古秘史》中的印藏文化痕迹	400
<b>后记</b>	408

## 引 言

假如本书的题目偶然间进入您的视线,使您伸手拿到了它,不妨浏览一下它的目录,倘若有引起您兴趣的篇目,请选择性地翻开看看,要是觉得与己无关,请立马掩书走人,不必耽误功夫。既然已经翻开了目录,又想在头脑中留下对本书的一点印痕,不妨再浏览一下本书每篇之首的简短导语,它会使您迅速了解这一章文字相对集中反映的一两个问题。大概不会占用您很多时间。当今信息时代,了解一些不同领域的动态,也算是一种知识储备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有不同历史文化,她们用各自的不同历史文化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不同民族在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彼此交往相互影响的实例可谓数不胜数,本文反映的仅仅是其中两个古老民族——雪山和草原的儿女们,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诸多剧目中的一点一滴花絮而已。她们的举动曾经引起过国内外历史、社会、民族、语言、文化等诸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迄今亦然。蒙古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彼此影响如何?国内外学者是怎么看的?欲想了解诸如此类的问题,请不妨阅读以下篇目。

## 蒙藏文化关系鸟瞰

蒙古族和藏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她们均有古老而灿烂的文化。她们在传统的中国史书上开始留下自己足迹的时间大体相仿。

“蒙古，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居住在呼伦湖以南的山林地带。”<sup>①</sup> 同书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sup>②</sup>除类似汉文记载外，蒙古族和藏族对自己开始走向历史舞台也有各种传说与记载。比如蒙古语的《蒙古秘史》、《黄金史》，藏语《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世系表》、《柱间遗教》、《红史》等。

从这些文字记载看，藏族先民是自中国西南边陲不断向东和东北方向扩展势力，经过数百年的奋进，逐渐步入四川、青海、甘肃一带。与此同时，从中国东北崛起的蒙古族先民向西和西南方向挺进，数百年后，其势力也抵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等地。于是，从两个不同方向前进的两个民族的先锋，开始在他乡境内有了接触，时间大约在 12 世纪末 13 世纪初。这个历史性的接触，为后来这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极其深刻。所以要想讲述蒙藏文化关系，不得不从这个源头开始探索。

① 蒙古族通史编写组编：《蒙古族通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年，第 3 页。

② 刘煦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219 页。

## 一、蒙藏两个民族的接触

首先,我们从蒙古人的文献传承中观察,他们是如何记述有关藏人的情形以及和他们建立最初关系的。

《蒙古秘史》是迄今发现的蒙古人用自己语言撰写的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成书于公元 1240 年。该书中已经提到了蒙古人与藏人接触的一些地名或种族名称,如“欣都思”(印度)、“脱孛都”(西番)、“唐兀都”(西夏)等。但是,从书中反映的具体内容来看,距蒙古人和藏人的直接对话时间还相去较远。比如蒙古人巴刺奉命追击逃亡欣都思的撒儿塔兀勒(回回)首领札刺勒丁莎勒坛和篾力克罕二人而深入其腹地,然后撤退,从其边城掠夺了诸多百姓和骆驼。照常规来估计,被俘虏的那些百姓中可能有藏人,因为吐蕃和印度接壤处的百姓具有杂居的特征。

印藏这两个民族的交往至少可追溯到吐蕃松赞干布时期。所以,蒙古人从“欣都思”人中了解“脱孛都”人的情形并非难事。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蒙古人从“唐兀都”了解“脱孛都”。因为“脱孛都”军事势力与宗教影响,同样在吐蕃王朝时期就已经到达了这一地区。藏人早先称“唐兀都”为“弭药”。据说松赞干布的五妃之一茹雍妃洁莫尊即“弭药”王之女,有记载云“……松赞干布还命令在弭药热甫岗建造了雍佐热甫嘎神殿”<sup>①</sup>,足见他们之间特殊关系的一个侧面。蒙古先民也有把“唐兀都”和“脱孛都”混为一谈的习惯,大概是由于这两个民族在人种体态上相似、地理位置上衔接、生活习俗上相同等诸多因素造成的。

<sup>①</sup> 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99 页。

据《蒙古秘史》记载，同唐兀都最早发生关系的北方人之一就是客列亦惕部王罕：

[他曾]经过委兀河西地面穷乏了，挤着五个羊，刺着驼血吃，骑着个瞎沙马来。<sup>①</sup>

此处的“河西”就是“唐兀都”。王罕众叛亲离，在异国他乡卑躬屈膝地生活，其经历在《圣武亲征录》里也有记叙。曾为成吉思汗统一诸蒙古部的伟业出过一臂之力的王罕，后来受他人的离间倒戈，与成吉思汗反目成仇，最终受挫：

汪可汗仅以子及数骑脱走，顾其左右谓其子亦刺合曰，我父子相亲，其可绝而绝之乎。今由此缓颊，儿绝矣。至捏坤乌柳河，为乃蛮部主太阳可汗之将火里速八赤帖迪沙二人所杀。亦刺合走西夏，过亦即纳城。至波黎吐蕃部，即讨掠，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众逐之。散走西域曲先居彻儿哥思蛮之地，为黑邻赤哈喇者杀之。<sup>②</sup>

有学者认为《圣武亲征录》与《蒙古秘史》的完稿相去不远。上面的引文可以证实，王罕曾经向西逃窜，避开内讧，经历了一段磨难之后返回本土。不幸的是他在临终时再次选择了他乡。其子则更胜一筹，他败北后逃入吐蕃境内，尚未站稳脚跟就被撵走，想必双方在如此交往中有所了解。此外，《蒙古秘史》中还提

<sup>①</sup> 巴雅尔：《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04页。

<sup>②</sup> 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原载：《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校注五卷》，清华学校研究院院刊，丙寅，第64—5页。

到“西番狗”<sup>①</sup>,对吐蕃人喂养的家犬都有了解。

14世纪初年,波斯政治家和史学家拉施特(rashid al-din fadl allah,1247—1318年)先后受伊利汗合赞(1295—1304年)和完者都(1304—1316年)之命修撰的《史集》(jami al-tawarikh),“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史,是当之无愧的当时亚欧历史的百科全书”<sup>②</sup>。该书涉及的蒙古史,特别是成吉思汗时期,几乎没有提到蒙古和吐蕃的关系。然而写到唐兀惕部落时却说:

以前蒙古人称这个地区为合申。窝阔台合罕的儿子,海都的父亲合申死后,禁用合申的名称。从此,这个国家重新被称为唐兀惕,迄今还称以此名。<sup>③</sup>

据载,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蒙古曾与唐兀惕进行过多次较量,并从唐兀惕掠夺得大批骆驼和财产。成吉思汗除自己娶了唐兀惕君主龙·沙答儿忽的一个女儿外,还从他们当中带来了一个叫兀察罕的15岁男孩子,收养为第五个儿子。他后来担任千户长。另外,成吉思汗还从唐兀惕俘虏中发现一个聪明的孩子叫不劣,把他带到自己的斡耳朵,这个孩子长大也当了千户

① 巴雅尔:《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22页。原文为:“mani tubed ud nohad eyen tuhirju ilegebesu dayin irgen-i ba tegri gajar-a huchu nemegdeju alta munggu agursun tawar irgen orhan chimadu abchirsugai!”其旁译是:“将俺如西蕃狗般使去,天若佑护,将敌人胜了,凡金银匹帛,都将来献。”笔者以为此译不确,应为:“西蕃若将狗向我们使来,受天地气力,我们将敌人胜了,为你把金银匹帛百姓人烟都将拿来。”两句区别在,前者是我犯人,而后者为人若犯我这个前提上。

②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3年,第1页。

③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3年,第234—238页。

长。蒙古人在同这些人的接触中也完全可以了解吐蕃的一些基本情况,因为那时西夏与吐蕃的交往早已达到非常密切的地步。

在《蒙古秘史》问世之后的几个世纪,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蒙古文历史文献。到了20世纪,人们才发现两本书——《十善福白史册》和《阿拉坦汗传》,多少能弥补这一空缺。从前一书中的某些记述中,对它的形成提供了如下可供猜测的三种不同年代:1、由忽必烈汗(1215—1294年)著或忽必烈汗时期(1271—1280年)撰写;2、由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1540—1586年)编撰;3、于至顺元年(1330年)撰。

该书说到忽必烈汗与八思巴之间的关系时,把他们提倡的治理国家必须政教结合的主张归结为由他们祖辈结下的缘分,说成吉思汗曾经向萨迦派首领贡噶宁波祈请,希望在自己的子孙后代中诞生一个能够政教并行的菩提萨埵者。这种企图把蒙藏关系追溯到吐蕃时期,甚至再往上追溯,把蒙古祖先同吐蕃或印度祖先一脉相承的说法,虽然有些异想天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传播此类说法者的一番苦心。他们认为吐蕃是佛陀教法盛传的圣地,而创立佛陀圣教的导师释迦牟尼诞生的圣地在印度,既然信仰佛教的吐蕃人来自圣人释迦牟尼的种族,那么,具有同样信仰的蒙古人的祖先也不能与那圣洁的佛祖相去太远。上面那种说法以及类似的其他传闻,对后世的确产生了深刻影响。

至于后一本书的问世年代,蒙古史学界认为是明末清初(1606)。该书对蒙藏两个民族的早期接触有如下描述:

征服世界使归治下之铁木真,……延请萨迦尊者  
贡噶宁波喇嘛来,……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汗,请来  
大能萨迦班第达喇嘛,……号忽必烈薛禅汗于世闻名,

此圣者请来呼图克图八思巴喇嘛。<sup>①</sup>

据引文中的说法,自成吉思汗起,子孙三代均和西蕃萨迦派宗教首领建立了供施关系。其实除了忽必烈(1215—1294年)和八思巴(1235—1280年)在历史上真正建立过福田与施主的供施关系之外,其余人的邀请与被邀请纯属子虚乌有。众所周知,成吉思汗(1162—1227年)与贡噶宁波(1092—1158年)并非同时代人,窝阔台汗(1186—1241年)在位期间无暇顾及脱孛都问题,而萨迦班底达贡噶坚赞(1186—1251年)踏入蒙古的时间是在窝阔台作古之后。人们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把蒙古和西藏的宗教联系尽量往前推,满足一种虚荣心理;另一是蒙古人仿照吐蕃历史上的著名法王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墀祖德赞(或墀热巴巾)祖孙三代宏扬佛法的榜样,试图说明自己祖先在某种程度上同吐蕃祖先行为具有一致性。

直到17世纪后半叶问世的蒙古文文献,几乎无不谈及蒙藏两个民族的接触,尽管还重复着前人的说法,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以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1662年)为例,至少有三处的记载和以往的不同。

其一:

(成吉思)45岁丙寅向脱孛都顾勒格道尔吉汗出征,脱孛都汗派遣以亦勒呼诺颜为首三百人和众多骆驼等敬品和使者表示归属,在阿沁大塘上与主会晤。主同意并向其汗臣送给大量供物让他们返回。主让亦勒呼诺颜返回时,向萨迦察格劳匝瓦阿难达噶尔贝喇嘛敬书曰:本想邀请你,因世间事迹残缺之故未邀请。

<sup>①</sup> 珠荣嘎译注校:《阿勒坦汗传》,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页。

我从这里信奉你，你从那里保佑我。自此征服了阿里三部以下三省八十八万哈喇脱率都百姓。<sup>①</sup>

其二：

窝阔台汗属相丁未，42岁戊子即位，虽拟邀请萨迦察巴坚赞而延误，六年后47岁癸巳归天。<sup>②</sup>

其三：

(萨迦班第达)……赴印度，与异端之六师辩难论驳。获班第达之号归来后，乃叔扎克巴·札勒灿者曾预言告之曰，此后，有一时，自东方来：冠若栖鹰，靴以猪鼻，房如木纲，凡三四语后，每发“额齐格因”之音者——乃蒙古国主，菩提萨都瓦之化身，库坦合罕，遣道尔达使者——来请汝。届时汝必前往，则汝之教义在彼大兴焉云。……谒见合罕，遂塑狮吼观世音菩萨像，收伏龙君，并授合罕以该项灌顶，作佛事之故，合罕之病即时痊疴，众皆欢喜焉。<sup>③</sup>

这些记载的内容已经变得比较具体而详细了。譬如其描述的西藏萨迦派领袖贡噶坚赞不是和窝阔台汗会晤，而是和他儿子阔端诺颜(库坦合罕)会晤，符合事实。发生如此变化，无疑与作者利用的藏文资料有关。萨囊彻辰在他著作的前后两处谈到

<sup>①</sup>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0—191页。又见道润梯步汉译：《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7—159页。

<sup>②</sup>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8页。又见道润梯步汉译：《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0—191页。以上两条引文由笔者重译。

<sup>③</sup>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2页。又见道润梯步汉译：《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1页。

自己所利用的几部重要参考书目，包括蒙古文、藏文和汉文，其中藏文至少有《本义必用经》和《红史》两种。

《蒙古源流》以及比它稍早问世的《黄金史纲》和《大黄册》，在叙述蒙古历史之前特意增加的一些内容，和传统说法大相径庭。它们的作者在作品中津津乐道关于世界形成、人类出现等哲学问题的一套佛教理论，并且还乐意把蒙古祖先的来历同西藏和印度王统联系在一起。这些观点不仅对后来的史学家，而且对普通读者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藏文文献中有关蒙古的记载，最早是从“霍尔”(hor)、“索波”(sog po)、“金格尔汗”(jing gir rgyal po)等名称开始的。然而无论是“霍尔”还是“索波”，起初并不专指蒙古。西藏的民间文学和史诗作品里，前者指北方强悍、暴烈的民族，后者指西方善经营马的民族。至于“金格尔汗”，是藏文对成吉思汗的习称。

西藏早期史书所反映的蒙古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蒙古王统从天子勃儿帖赤那开始罗列到成吉思汗，再从成吉思汗位开始罗列他的继承者，一直写到被汉族明朝推翻为止。附带说明的仅仅是这些即位者在位的时间和个别人的某些特征而已。这些原本来自蒙古文献的资料，经过藏人的手重新表述时，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如有叫错人名的，有把一个人当作两个人的等等。我们仅以《红史》、《王统世系明鉴》、《汉藏史集》、《新红史》的记载为例。

据《红史》讲：

……塔马察的儿子是齐吉蔑尔干，现在据说他是镇伏魔怪的白玛迥乃(莲花生)大师。

成吉思汗三十八岁时，聚集百姓，登上王位，在位三十二年，于阳火虎年秋七月十二日六十一岁时在西夏尕地方升遐。

当妥欢帖睦尔放弃京城时，达仓巴的巴希贡噶仁钦正在大都城内，据他叙述，当时大都城内纷纷传扬说反叛的军队将要到来，故于羊年五月十一日返回蒙古地方，看来这个说法是确实的。<sup>①</sup>

《王统世系明鉴》所载蒙古王统与汗位继承的说法基本上和《红史》一致。但是，上摘三条中只存第一条，“塔马察的儿子是喀切墨尔根（原注：相传此王为古茹佛转世）”<sup>②</sup>。

虽然在《汉藏史集》中上摘《红史》的那三条都保留，但说法有较大出入。比如：1. 塔马察的儿子是察尔蔑儿干，据说他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2. 成吉思汗 33 岁的羊土虎年，继西夏甲郭王之后，又以武力从当时统治汉地名叫托孜的国王手中夺取了都城。于 66 岁的羊火猪年秋七月十二日，在木雅噶地方升天。3. 妥欢帖睦尔即位后 26 年，即阴土狗年，帝师贡噶坚赞（《佛祖历代通载》作公哥儿监藏班藏卜，1333—1358 年任元顺帝的帝师）圆寂，蒙古的大臣们反叛，上都宫殿被火焚。<sup>③</sup> 这里所涉及的人物名称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在时间上具有如此大的差别，足以说明史料来源的不同。《汉藏史集》所讲述的内容显然比上述几本书要多。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里，我们不能不产生如下看法：在藏人的笔下，成吉思汗的祖先里已经有人同印度的高僧即 8 世纪来到西藏传教的莲花生大师发生了关系，这一点在早期蒙古史里未

<sup>①</sup> 蔡巴·贡嘎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25—28 页。

<sup>②</sup> 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王统世系明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8 页。

<sup>③</sup>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56 页。

曾提及；其次，已有成吉思汗的势力侵入西夏而他自己就在西夏归天的记载，这与蒙古史吻合；再次，蒙藏之间的接触似乎并不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而是更早。我们从历史事实可知，蒙古人和藏人官方的直接接触是在建元之前，自阔端和萨班的会晤开始。元代西藏宗教界的人士频繁来蒙古朝廷任职，与历任可汗结成施主和福田关系。

自《红史》起（除了《王统世系明鉴》等个别史书外），几乎所有藏文文献无不谈及阔端和萨班在凉州的历史性会晤。尽管它们叙述的详略不同，但使用的资料及谈论的要点是一致的。譬如，阔端向西藏派出以多尔达为首的使者；萨迦班底达遵照前人哲卜尊扎巴坚赞的预言率领两个侄子赴蒙古；萨班与阔端会见，宏扬佛教等。我们不妨摘录其内容，做些比较。

《红史》载：

皇子阔端由北方，即凉州派人前来迎请他，以前杰尊扎巴坚赞预言过：以后由北方来一与我们语言族属不同、头戴飞鹰似的帽子、脚穿猪鼻靴的人前来迎请，如应邀前去，对佛教大有利益。依照这一预言，贡噶坚赞于六十三岁的羊木龙年，伯侄三人前去，路上走了三年，于马年到达凉州。此时皇子阔端前去参加贵由大汗的即位典礼去了，到回来时在羊年与萨迦班智达会见。班智达获得了祭天大典的首席长老的地位，弘扬佛教，此上师享年七十岁，于阴铁猪年逝于凉州。<sup>①</sup>

《汉藏史集》载：

法主萨迦班智达于彼六十三岁之阳木龙年应蒙古

<sup>①</sup> 蔡巴·贡嘎多吉著，东嘎·罗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页。